

吴慧

中国古代商业史

第二册



中国古代商业史

第二册

吴慧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商业史

第二册

吴慧 著

✻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市顺义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 12.5印张 292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4237·099 定价：1.25元

目 录

第二编 封建地主制国家完成统一和 再走向分裂时期的商业

第四章 秦和两汉的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	(3)
第一节 秦统一和西汉时期的国内商业……………	(3)
一、秦统一为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3)
二、西汉商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5)
三、经济区域的形成……………	(10)
四、城市的发展……………	(15)
五、城市中的商业区和市场管理制度……………	(18)
六、城市中商业行业的分细和商品种类的增 多……………	(22)
七、西汉时的商业利润……………	(25)
八、西汉商业发展的限度……………	(28)
第二节 西汉前期的富商大贾……………	(36)
一、汉初的贱商令……………	(36)
二、无为政治下商人势力的继续膨胀……………	(40)
三、商业资本的主要活动方面，富商大贾的 主要代表人物……………	(42)
四、商人“为富不仁”所造成的社会问题……………	(49)
五、抑商政策和经济干涉思想的重新抬头……………	(53)

第三节	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发展官营商业	
	的新财政贸易政策·····	(60)
一、	财政危机与汉廷的决策·····	(61)
二、	多次改革币制，商人从中取利·····	(63)
三、	算缗告缗，剥夺商人·····	(66)
四、	盐铁专卖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68)
五、	确立五铢钱法，稳定币值物价·····	(73)
六、	创办均输制度，建立平准机构·····	(75)
七、	酒类专卖——又一项新的财政措施·····	(82)
八、	盐铁争议和桑弘羊的理财思想·····	(83)
九、	桑弘羊之后的西汉商业·····	(87)
第四节	西汉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的发生与发	
	展·····	(93)
一、	发生在西南和东南边疆的民族贸易·····	(93)
二、	与东北、西北沿边各族的贸易往来·····	(97)
三、	西汉和匈奴的战争与贸易关系·····	(99)
四、	通西域后民族贸易向更远的发展·····	(102)
五、	对中亚、西亚各国贸易的开始·····	(105)
六、	东北和朝鲜日本的贸易，南方海路和南	
	亚东南亚诸国的贸易·····	(111)
七、	西汉时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的特点·····	(112)
八、	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的作用·····	(118)
第五节	王莽改制的失败·····	(124)
一、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激化·····	(125)
二、	王莽的土地“改革”方案·····	(129)
三、	管理城市经济的五均赊贷法·····	(131)
四、	笼盐铁，专山泽，恢复酒类专卖·····	(133)

五、八年间的四次币制改革·····	(137)
六、王莽改制的实质·····	(140)
七、王莽政权垮台的原因·····	(144)
第六节 东汉的商业和商人地主豪强·····	(149)
一、在生产恢复发展基础上，国内商业 的重新发展·····	(151)
二、市场上畸形现象的加重·····	(156)
三、时断时续的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	(157)
四、豪族当政与商业政策的变化·····	(162)
五、富商大贾势力空前膨胀·····	(165)
六、商人地主豪强兼并土地，捐买官爵·····	(167)
七、自给性增强的田庄经济的出现·····	(171)
八、兼并势力上升为割据势力·····	(174)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商业·····	(182)
第一节 三国时期南北方的商业·····	(182)
一、曹魏统治下北方商业的恢复·····	(182)
二、西蜀地区商业的活跃·····	(189)
三、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商业的发展·····	(193)
四、三国货币制度混乱，实物经济抬头·····	(200)
五、各地方政权之间的通商·····	(204)
六、三国与四边少数民族的互市·····	(207)
七、中外贸易的继续发展·····	(211)
八、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及其对商业发展的 影响·····	(214)
第二节 西晋和十六国的商业·····	(226)
一、短暂统一的西晋的商业·····	(226)
二、商业发展受限制并日趋畸形化·····	(231)

三、十六国时期北方商业的破坏与缓慢恢复···	(239)
第三节 东晋南朝的商业和对外贸易·····	(248)
一、经济的发展与商业的前进·····	(249)
二、南方繁荣的城市商业·····	(254)
三、市制的继续与草市的出现·····	(258)
四、交通的发达与地区间贸易的加强·····	(262)
五、南北通商及其与周边各族的互市·····	(266)
六、对外贸易的继续发展·····	(270)
七、时紧时松的货币政策及其对商品经济的 影响·····	(275)
第四节 北朝的商业和对外贸易·····	(286)
一、北魏早、前期的社会经济与商业·····	(287)
二、北魏改革至北周统一时北方商业的发展 概况·····	(292)
三、北朝的市制与城市商业·····	(300)
四、北朝的货币制度及其对商业的影响·····	(306)
五、北朝同南方的通商·····	(311)
六、北朝与西域以及周边各族间的贸易关系···	(314)
七、北朝对外贸易的发展·····	(318)
第五节 东晋南北朝的官营商业和商税·····	(326)
一、南北政权的盐铁政策·····	(326)
二、酒禁、私酿和榷酤政策·····	(335)
三、和市和余，官营商业活动的又一方面·····	(338)
四、南北方的关市之税·····	(342)
五、东晋南朝的估税制度·····	(349)
六、包税制在南方的形成·····	(351)
第六节 东晋南北朝的私营商业和地主、官僚、	

寺院经商	(358)
一、民间的中小商人	(359)
二、富商大贾的活动及其与官僚的勾结	(362)
三、地主经商的新动向	(367)
四、盛行南北的官僚经商	(371)
五、寺院地主兼营商业与高利贷的活动	(381)

第 二 编

**封建地主制国家完成统一
和再走向分裂时期的商业**



第四章 秦和两汉的国内商业 与对外贸易

第一节 秦统一和西汉时期的国内商业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自号“始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第一个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结束了战国时封建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但由于秦始皇滥用民力，赋税太重，刑罚太酷，加深了农民与封建地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胡亥、赵高当政后穷奢极侈，贪敛更急，暴虐更甚，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本末并失”的秦王朝只维持了十六年就垮台了。刘邦（汉高祖）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重建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西汉（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5 年）。在西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国势称盛。于此条件下，国内商业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一、秦统一为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从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客观上就有利于国内商品流通的顺利发展。而其中的一部分措施，如通关塞、修驰道、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更直接给当时以至西汉时期国内商业的发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在六国割据时，各国都在边界上筑有城堙，在河道上设有堤防；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把这些分裂疆土、阻塞交通、以

邻为壑的障碍物都平毁了。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秦始皇动员民力修筑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通燕齐、南连吴楚的两条“驰道”，以及由九原郡（今内蒙古五原县一带）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直达咸阳、“凿山堙谷”的一千八百多里的“直道”。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植以青松”^①。为了开发岭南和军事运输的需要，还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开凿了沟通湘江与漓江的越岭人工运河——“灵渠”。鸿沟也疏通了，作为通济、汝、淮、泗的水路中心。这些规模非小的工程的完成，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虽然秦始皇在这方面大事兴作，主要有他自己政治上、军事上的目的，但由于全国水陆交通的建设，由于统一了全国车轨轨距（“车同轨”），也大大方便了各地的物资交流和商旅往来。六国时的关税随同关塞的打破而取消了^②。在全国统一、商路畅通、关梁无阻、往来不交关税的新环境下，商人们到处活动，和战国时代关卡重叠，市场分割的情况相比，买卖自然要好做得多。

战国时代，各国之间以至同一国家（秦以外）各地之间，铸币的形式、轻重、大小和计算单位都不一致，换算困难，有碍各地区间的商业往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行了货币改革，规定只用两种货币：一种是黄金，大额支付用，称为“上币”，作马蹄形，以镒（秦制镒为二十两，始皇改为二十四两为镒）为单位；一种是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方孔的铜钱（圜钱），日常交易用，称为“下币”，以半两（十二铢）为单位^③。珠玉龟贝银锡都只能作器饰宝藏，完全逐出货币流通之外。至此，秦国的圜钱制度就推行到全国范围，铸钱权完全归于国家，战国时各国各地的各式货币宣告废除。秦始皇的统一币制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商品交换，而且也对后世发生深远的影响。

以后各代的“量名钱”（如西汉五铢钱）和“年号钱”都是圆形方孔，成为定制，长期当作主要流通手段使用，其源盖出于秦之圜钱。

战国时代秦国本身和其他各国虽不同程度地注意了度量衡的统一，但各国之间的度量衡不一致。度有尺、步、寻、仞，量有豆、区、釜、锺，合、升、斗、石，衡有斤、铢、钧、石（一百二十斤）等，各种计算单位，名目既繁，进位各异，大小还有一定程度的出入。秦始皇统一后下令沿用商鞅的量器和尺子，衡器略有变更，制发了度量衡的标准器具，上面刻上（陶制量器是印上）统一度量衡的四十字诏书，给各地遵守，不许民间私造不合格的度量衡器。度量是以十进计算，尺丈、升斗各以十进，衡则以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度量衡的统一，便利了封建国家赋税的征收，也便利了人民的经济往来和商品交换。

秦始皇实行“上农除末”的政策，扶植个体小农和新兴地主，对民间小工商进行抑制，对六国的富商大贾进行打击，迁往岭南的五十万人中很大部分就是贾人和商人的后代（“七科谪”）。但他的矛头主要只是指向弃农经商者、过多的商业人员和作为分裂、兼并势力的商业资本，并不影响商业的正常发展。在当时全国统一、关梁无阻的条件下，地区间的物资交流，特别是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贩运贸易，事实上还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发展余地的。

二、西汉商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秦末，由于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和各武装集团为争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而展开连年的战争，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人口凋零^④，都市衰落，农业废弛，耕畜稀缺，商业的发

展一时也遇到极大的挫折。西汉初期统治者采取了各项调整措施：分给逃亡人民、复员军士田宅，鼓励人口增殖，释放男女奴隶，节省政府开支，一再减免赋税和徭役，与民休息，而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重新发展起来。经过“文景之治”到武帝即位之初，“七十余年之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⑤。“自京师（长安）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⑥。商人的车轮又在宽阔的轨道上圆顺地转动着，市场上重新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商业的重新发展，承秦时开创的国家统一的局面，“通关梁”、“一符传”，驰道四达、交通便利的情势，当然仍是其必要的条件。正如史家所说的：“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⑦。但是，这些不是决定性的，只有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才真的是商业发展的根本原因，为国内频繁的商品流通提供了物质基础。

西汉的农业是在牲畜繁殖、牛（马）耕推广、水利的兴修、铁制农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等因素的作用下，获得发展的。到武帝末，较大的铁犁（“大器”）推广，黄河流域使用以二牛合犍的耦犁（二人在前牵牛，一人在后扶犁），还开始使用一天能播种一顷地的耒车。先进的“代田法”（一亩分成三条圳，圳上是垆，圳垆的位置轮流调换）开始在关中和西北边郡运用，配合牛耕、粪田，提高了产量。成帝时还研究出一种园艺式的“区种法”，产量更高。水利工程在武帝时也大量兴办，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灵轵渠、漳渠，以及各地开凿的渠道，都增加了大量的溉田，与未得水前

比，高田产量增加五倍，下田增加十倍。农业的发展，表现为重建了小农经济，依靠农民的力耕，全国的垦田面积有了增加。文帝时已有“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⑧之语；以平帝时的数字计算，口数 5959 万余，户数 1223 万余，垦田数 827 万顷，城乡合计，平均每口垦田数 13.88 亩，平均每户垦田数 67.61 亩（约合今 20 亩）^⑨，数字确已不小，每户自耕农民所占的耕地数字更高。农业的发展还表现为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且不说沃田溉田以及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后的高产数字^⑩，以常年一般产量而论，在西汉前期（文景时）已达每亩（小亩，百步为亩）产粟三石（小石，一石合今两斗）^⑪，比李悝的每亩（百步为亩）产粟二石五斗（小石）已有不小的增长。这样，按农业人口计算，粮食的生产水平（每个农民占有的耕地×每亩粮食产量）比战国时就有相当的提高了。秦时人口约二千万，假如秦汉两代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变，农民每人平均耕地数字大体上相同，则到西汉末期由于人口增长垦地扩大单产提高，粮食总产量大致应为秦时的三·六倍（人口增长速度×亩产增长速度）。农民所生产的粮食中，除了自留食用（每人每月平均口粮约为粟 2.5 小石）外，为交纳算赋（成年男女每人每年 120 钱）、口赋（小孩每年交 20 钱）、更赋（服役年龄男子每年交 300 钱），购买必要的生活生产资料，需出售部分粮食以换取现钱。设西汉时粮食商品率与战国和秦时相近，则西汉时粮食的商品量大致也比过去增加二倍半还多。粮食贸易的如此扩大是西汉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数量标志。

在粮食贸易有所发展的同时，农业生产中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门以出售为目的，以经济作物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生产。如“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

渭川千亩竹”、“千亩卮、茜（红蓝花，染料作物），千畦（二十五亩）姜韭”，还有“山居千章之材”，“水居千石鱼陂（陂泽养鱼、一百二十斤为石）”。^⑫这些都是由地主（或商人兼地主）经营的获利优厚的产业，增加了市场上所流转的商业品种，有的是为手工业提供的重要原料。

手工业在西汉也有相当的发展。由于手工业品受原料生产地的限制，生产的地方性较强，而消费范围却广及各地，所以更需要通过商业来进行推销。纺织业是西汉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临淄、定陶、任城、成都、襄邑、河内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麻布以西蜀为上品，齐陶也有出产。除农民家庭纺织麻布、葛布、普通绢帛，在自用和缴纳贡赋之后，有部分用于交换以外，城市里有从事纺织的个体手工业者，生产缣帛等作为商品出售，还有富家经营的手工作坊，以其精美的产品如绫、锦、绣、縠、纱等，售于贵族、官僚、地主、富商。官府拥有庞大的纺织手工业，有时也可能有部分产品投入市场。西汉时纺织品社会总产量很大，在供应国内消费的同时，还大量地输往国外。手工业中的漆器、金银钹器有很高的工艺水平，蜀和广汉是主要产地，当时这些贵重的高级消费品，行销远近各地。铜器的私人作坊产品种类繁多，其中铜镜最为著名。为人民日常生活需用的陶器也较前代有所进步，已知用釉设色，盛酒之瓮有“绿瓷”之称。造船业有突出的发展，“吴地数千里，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⑬，常用船宽五至八米，长达二十米左右以至四十米以上，载重约五、六百斛（合25至30吨）。楼船的楼层增加（三层或四、五层），高达十丈（合今七丈）。船的样式很多，桨、橹、帆、舵、锚俱备，大的两旁各有二十三桨，更大的能远洋航行。舟船既是便利商品流通的交通工具，也是当时市场上的一种重要商品。

盐铁两项产品在西汉城乡市场上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山东（太行山东）食海盐（煮的），山西食盐卤（石盐、池盐，晒制成的），岭南沙北往往出盐”，^⑭西汉中期蜀地的井盐也有了发展。“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铁产地比铜分布更广。由于冶铁规模的扩大，炼钢技术的提高（西汉中期已在过去用块炼渗碳炼钢的方法的基础上发展为反复加热渗碳锻打次数增多、并经淬火的早期“百炼钢”，含碳不均匀的分层现象和夹杂物比过去减少；西汉后期更发明了把生铁加热熔化加以搅拌的“炒钢”法），西汉制铁业除冶铸农具和手工工具以外，已开始大量生产钢铁制兵器和灯、釜、炉、剪、刀、锁等日常生活用具，后者已普遍使用于南北各地。

就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日益繁荣起来。“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⑮，没有农工虞（山泽）开辟大量的产品来源，商业还是无法充分行使其流通的功能的。不过，当时除了粮食、纺织品的贸易在市场（主要是城市）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外，商业的活动主要仍是从事于各地区土特产以及地方性手工业的物资交流，远距离的贩运贸易仍占很大的以至主要的比重。“夫山西饶材、竹、穀、纆（纆属）、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铅之未炼者）、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⑯。春秋战国以来各地自然资源和物产的地域分工与商品生产化的程度，在西汉时继续向前发展着；品种增加，交易量扩大。其中珍奇货贿仍是交易的十分重要的内容，所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⑰，地区间的贩运商与“三宝”紧相联系的传统观念仍未改变。但是，与一般人的生活有关的物资也越来越多在各